

秦汉园林景观与士人思想研究

徐朦朦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8)

摘要:秦汉作为我国古代史上第一个实现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其园林建筑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为规模宏伟、装饰奢华,象征着帝国的权威和财富。这些特征对世人,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传统知识分子的“天下”理想中。而重视个人容止,则成为汉末魏晋“人的自觉”的前奏。通过梳理文献记载中的秦汉园林景观,分析秦汉园林建筑艺术中所蕴含的审美风尚和思想观念,探析其形成因素和影响,对于研究秦汉时期的士人思想状况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秦汉园林;天下;审美风格;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9.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6)02-0080-05

Gardens in Qin-Han Dynasty and the Study on the Thought of Scholars

XU Meng-meng

(School of Art,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Qin-Han dynasty was the first feudal nation which realized unity in ancient history.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its garden showed great range and luxurious decorations, which was the emblem of the nation's power and wealth. These aesthetic features had an influence on people's thought, on managing the country, especially on the intellectuals. Taking attention to one's own appearance had become the prelude of "Human Awareness" in Late-Han and Jin dynas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esthetic fashion and ideolog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Qin-Han Dynasties according to the literal work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ts formation, which ha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thoughts of people in Qin-Han Dynasties.

Key words: gardens in Qin-Han dynasty; the world; the style; thought

公元前221年,秦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结束了春秋战国近500年的“战争状态”,华夏大地终于走向了统一,由此开始了一段前所未有的辉煌时代。《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载有李斯等人的上书:“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1]216}肯定了秦始皇的功绩。

为巩固政权,统治者废分封,行郡县,这是三代以来制度之大变。更有“书同文,车同轨”^{[1]220},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力量将整个华夏地区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书同文”,以文化为纽带,使之成为维系华夏文明的血脉,也使得整个民族、国家,即使在分崩离析之际,都始终存有一丝生机,而不至于彻底地分裂。

秦王朝虽统一了中国,但其寿命极为短暂。汉代贾谊如实分析了其败亡的原因,“商君遗礼仪,弃仁思,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2]244}可见,

秦王朝重商鞅,推法家之术,行严刑峻法,论功行赏,正因如此,秦国才能在战国七雄的兼并战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统一全国。但是“战争状态”并非政治、社会生活的常规状态,严刑峻法破坏了日常的社会生活,“始皇既殁,胡亥极愚,骊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1]292}秦王朝因其以灭。

经历了之后四年的“楚汉之争”,华夏大地重新获得统一。汉王朝吸取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对秦朝的治国方针在有所损益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史称“汉承秦制”,其废严刑,罢重典,在社会治理方面推行儒家礼乐教化,使自秦改制以来的大一统制度终于稳定下来。

毋庸置疑,园林建筑作为一种象征艺术,必然会体现时代的审美观念。此时,作为游离于国家和民众之间的知识分子,其“自觉”仍未发生,园林建筑更多的是象征帝国统治的权威与财富。《史记·高祖本纪第八》载萧何与刘邦之言,“且夫天子以四海

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1]386}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统治者的审美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便决定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尚。

一、秦汉园林的特点

秦汉时期的园林建筑,作为帝国权威与财富的象征,同样也呈现了大一统的帝国风格,其规模之宏伟、装饰之奢华、成就之辉煌,是此后的历代王朝所难以企及的。

唐人杜牧在其《阿房宫赋》中如此形容这座皇家园林的规模:“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3]318} 此言可略观当时园林建筑的艺术特征,并做以下详细分析。

(一)宏伟的规模

若说杜牧之言多夸张、想象之辞,不足以全信,那么《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的记载则足以佐证,“隐宫徙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1]256},足以见其规模之宏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大一统帝国的审美风尚之一,即对规模宏伟、整齐统一景观的追求。这种审美风尚并未随着秦王朝的灭亡而消失,反而在之后的汉代园林建筑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汉书·司马相如传》中记载《上林赋》中关于天子园林的规模,“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2]257}“亡(无)是公言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2]257} 关于上林苑的规模至今多有争议,但司马相如的作品一定程度上会体现了时人的意识和汉朝的审美观。胡塞尔认为“意识的主观和意识本身不能与意识的对象性东西分开去考察,而是相反的,意识在自身中就具有被意识对象本身。”^{[4]86} 现象学要求将独立于意识的物质世界进行“悬置”,回到“事物本身”,即回到意识之中。反观司马相如对天子上林苑的描述,甚得汉武帝欢喜,就进一步证实当时的上林苑规模之宏大,气魄之雄伟。

最迟成书于汉代的《三辅黄图》,有多处言及当时有着宏伟规模的园林:“汉上林苑,即秦之旧远……方三百四十里”^{[5]270-271},又有言:“甘泉苑,武帝置。缘山谷行,至云阳三百八十里,西入扶风,凡周回五百四十里”^{[5]281},与这种追求规模宏伟的审美趣味相合的,便是此时园林建筑中所蕴含的重奢华、奢靡的美学风尚。

(二)奢华的建筑

秦汉园林如此雄伟的风格,配之而成的是其奢华的装饰。杜牧就以夸张的想象描绘了阿房宫内部的华丽:“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袖冷殿,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3]316}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记载秦国对他国财富的掠夺,“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陂之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1]239} 可见,园林之中充斥的是奢侈生活,这也正是大一统帝国对于财富、权威的重视。而这种追求奢华、奢靡的审美倾向在汉朝园林建筑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秦王朝的园林所体现的更多的是统治者的欲望,而汉王朝的园林则更多地体现了与时代相关的审美观念。

对于司马相如进的《上林赋》,汉武帝因其辞过于华丽,其所言之事过于奢靡,故而只取其中符合“道统”的部分:“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上古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用之。”^{[1]2043} 尽管如此,汉武帝仍然以之为郎,可见他对此篇文章的喜爱,不仅仅是由于作品称赞天子的德性,也有部分原因归结于此赋体现了当时的时代气象,即帝国对绚烂、艳丽的美学景观的追求。

(三)文学观念与地理渊源

秦王朝园林所体现的审美风尚,一方面是以宏大、奢华的艺术形式,象征其不容侵犯的权威,这是大一统帝国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与汉王朝的统治者——刘氏家族的发源地,有极大关系。刘邦为沛县人,在今江苏丰县,其时为吴越之地。吴越历来与荆楚关系紧密,常并为一谈。南国是“巫风未衰”之地。正是由于对神的观照、冥想中,南国文化才呈现出像“楚辞”一般异于北国礼乐文化的艳丽、奢靡、奇特、宏大的特点。

而汉王朝的统治者必然会受到这种审美风尚的影响,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从而影响其审美观念的形成。“(汉王朝)基本上继承了秦代体制,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尤其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6]72} 审美趣味因“依附”重要政权,便可能成为时代的审美风尚。而此时的知识分子或是投“君上”所好,进而踏上仕途;或是畏于权威,只能以这种委婉的艺术形式,来“致君尧舜上”。

众所周知,汉赋脱胎于楚辞。观《上林赋》其文:“掩以绿蕙,被以江蓠,糝以靡芜,杂以流

邑。”^{[1]3022}与屈原《离骚》之“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所使用的意象几近相同。可能正是由于南国楚地审美观的影响，汉代的园林建筑艺术才会有如此的特点。而艺术作为人本质的对象化，其必然也会对人的性格、举止言行等造成影响。

二、秦汉园林的文学思想

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环境中，园林建筑艺术作为帝王权威的象征，其背后所隐含的，无疑是统治者一统天下的情怀。而这种审美倾向，对依附于政权的知识分子来说，必然会对他们的人格塑造、治学态度、言行举止等产生极大的影响。

(一) 知识分子的“博雅”

前文已言，秦汉园林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宏丽的艺术特征，其宏伟的规模，给知识分子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崇高感，更有对其治学态度的影响。秦汉时期的知识分子治学多以“博雅”见称。《颜氏家训·勉学》有言：“汉时贤俊皆以宏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7]176-177}

此时身居卿相之位者，多为博学之人。当然，这种学风的出现，一方面是“秦火”之后，时代需要这种人才来重新整理典籍，阐明学理；另一面，政治也需要人才为其政治意识形态服务。《后汉书·荀淑传》言荀淑：“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8]2049}同书卷六十四《卢植传》有言：“卢植……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8]2113}可见，影响至深。

(二) 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人格精神

审美风尚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并不仅仅停留在治学之上，更包括对其人格的塑造和培养。知识分子作为“道统”的继承人，其中一个重要责任即是维护儒家的礼乐教化传统。太史公评价司马相如：“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1]2073}

即使是司马相如，这般能洞察君上所好之人，其内心深处仍将自己作为“道统”的继承人，竭力推行其理念。但知识分子所坚守的“道统”往往与统治者的“政统”相冲突，尤其是在“邦无道”之际，他们往往会因为坚守其理念而落得惨烈的下场，也正因如此，更突显其人格之伟大。

同时，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难免出现外戚或宦官把持朝政的情况。尤其在东汉后期，宦官专政愈演愈烈，东汉的知识分子与宦官集团的矛盾由此愈加严重，这种冲突不仅仅是由于政治利益，更有

其深层理念、信仰的对立。

《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范滂传》言范滂：“汝南人范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8]2203}《世说新语·德行》评东汉士林领袖李膺：“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9]7}

“士志于道”“处士横议”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高扬，是传统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入世，即使是死，也要坚守自己的理念和信仰。这种“杀身成仁”“敢为天下先”的观念，体现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的“舍生取义”的时代精神表征。

(三) 知识分子重“容止”

学者余英时在《汉晋之际使人新自觉与新思潮》中说：“人物评论为汉末清议之要旨，亦魏晋玄理清谈一部分之所出。……东汉人物评论起源甚早，初年即已有之，但其风转盛则在中叶之后。”^{[10]216}汉朝人，尤其是东汉人，极其重视人物品格与容貌，这与当时的选举制度，即察举制，有很大关系。屠隆《鸿苞节录》卷一言：“晋人重门第，好容止。崔、卢、王、谢弟子生发未燥，已拜列侯；身未离襁褓，而已被冠带。肤清神明，玉色令颜，缙绅公言之朝端，吏部以此臧否。士大夫手持粉白，口习清言，绰约嫣然，动相夸许，鄙勤朴而尚摆落。晋竟以此云扰。”^{[1]3022}可见，当时重容止的夸张程度。

而对于容貌的重视，又与汉末的人物评论有极大关系。由外表而至实质，是人物品评的关键。《后汉书》卷六十三《李杜烈传》有云：“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盘，盘旋偃仰，从容治步，曾无惨怛伤碎之心。”^{[8]2084}

汉朝实行察举制和征辟制并行的选官制度，这必然会涉及到对人物品藻、德行的评价。而重视仪表本就是儒家礼教文化对人的一项基本要求。个人仪容就是其德行、操守的外在体现。大一统的帝国，尤其重视种种外在的修饰，因而秦汉园林的奢华装饰，让世人惊叹。魏晋之际，世人抛弃了两汉对德行的追求，而转变为对个人性情、品藻的推崇，则标志着“人的自觉。”^{[16]72}

三、秦汉园林的“天下”观念及其文学思想

秦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现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时期，其必然需要一套意识形态为其统治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来源，以维护整个帝国的安全与稳定。秦王朝奉行法家之术，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加上“焚书坑儒”等政策，侵犯了缓和与国家与民众冲

突的中间阶层,使两者的矛盾激化,最终在短时间内走向覆灭。而汉王朝的统治者则对知识分子采取“为我所用”、恩威并重的政策,利用其话语权为其统治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正是这一系列的原因,汉代的思想体系较之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一)秦汉园林所蕴含的“天下”观念

儒家建立的初衷即是从积极方面维护社会秩序,因此,儒家思想自然就成为统治思想。秦王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最终造成的是“强国家、弱社会”的局面,严重破坏了思想的自然发展。汉代儒学从“心性论”转变为“宇宙论”的部分原因应归于此,但这种转变则是“儒学衰微与中国文化精神衰变之枢纽所在。”^{[11]15}另外此转变与汉代统治者的“集体无意识”也有关联,前文已言,汉朝刘氏源于南国民间,其必然会受到民间神仙、方术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汉朝历代统治者的喜好上多有显现。

君上所好必然会影响到思想体系的建立,这种“宇宙论”思想在其园林建筑艺术中亦有所体现。《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言:“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11]241}这是时人思想中“天人感应”观的反映,人间秩序的建立需以天的秩序为其“理式”。这种观念在汉代,因国力的强盛,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大,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史记·孝武帝本纪》有言:“其北(按:建章宫)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亚梁,象海中仙山龟鱼之属。”^{[11]482}

《史记·秦始皇本纪》言三神山:“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又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11]247}

这些足以证明秦汉园林建筑艺术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同时也是大一统帝国的意识形态的来源。秦朝统治者极其重视神仙、方术,曾多次派人到海上寻求仙药,而汉朝的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尤以汉武帝为甚。《史记·孝武帝本纪》通篇皆言其求仙之事,甚至封术士为官。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国家权力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而此时儒家也借民间神仙体系,以“宇宙论”作为其理论的基源,虽从哲学脉络上背离了先秦儒家的“心性论”,但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则为儒家的治世理论提供了确切的证明。儒家的这种转变与统治者的意图不谋而合。董仲舒明确“天人感应”之说,并将其系统化,使之成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正统思想。

也只有大一统的帝国才有如此的雄心壮志,也只有如此的时代,才会有如此宏伟的建筑艺术,其所象征的不仅仅是帝国的财富,君王的权威,更象征着一个灿烂、辉煌文明的精神风貌。贾谊在《过秦论》中言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13]233}这样的观念在之后的汉王朝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其园林建筑中的象天应地,天人感应即为表征,而这种“天下”观念对于世人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二)“天下”的思想

“天下”观的形成源远流长,先秦已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2]643}之说。“天下”是中国思想中特有的观念,其超越了地理界线,更多的是一种民族文化,一种心理情感,而这也构成了中国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特有的思维方式。

前文已言,汉代知识分子多有“澄清天下,匡扶社稷”的伟大志向,这种人生理想正是受“天下”观的影响。文化作为维系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因素,凡是受此文化影响之人,自始至终都会为其民族文化保持一丝血脉。“以天下为己任,死而后已”,这样的人格与“天下”观相得益彰,整个民族即使到了危急存亡之际,仍会有一丝生机尚存。

之所以有如此观念,一则是由于汉代推行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中央政府与贵族、地方豪强的利益冲突更为激烈,如此则使传统学人有了更多的自由,其所依附的并非只有中央政府,所遵循的仍是其“道统”,而非“政统”;二则是其坚持先秦以来的学理,天下并非一人一姓之天下,而是有德之人的天下。这种观念在汉之后中央政府完全瓦解了贵族势力之后也随之而亡,不为后来的学人所了解。后人往往批评扬雄支持王莽政权,实是未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

“天下”观在内部结构上是儒家推己及人的亲疏关系,正是如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并不会在学理上预设敌人与异端,而是试图寻找共同点,而这也是儒、释、道等诸家思想,之所以能合流,共同推动思想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同样“天下无外”原则也为我国在上世纪提出“求同存异”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来源。在赵汀阳的论述中,“天下”在当今世界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其预设世界应是以他国利益为本国利益的前提,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建立应以互利为基础,而非敌对,因此可以说“天下”观为解决国际纷争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答案。

秦汉园林所体现的“呈天地于一园”的“天下”观与大一统帝国追求宏伟、奢华的审美倾向

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但是这种审美风尚又有其负面影响。

(三)秦汉园林文学思想的影响

汉代知识分子的“存在”需依其所坚守的“道统”,其所追求的仍是德行人格,而未自觉地追求性情之自由,因此,此时的园林建筑仍是帝国权威的象征,所展现的是帝王的雄才大略和野心。这种审美风尚的实践,必须依靠强大的中央政权,因此必然会对社会造成破坏。贾谊如此描绘秦王朝的暴政:“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13]235}

秦“隳名城”与孔子当年“隳三都”的目的都是削弱地方势力,强化中央集权。儒家以建构社会秩序为目的,因此极易为统治者所用。秦汉时亦不例

外,虽秦行法家之术,但在社会生活方面仍然默认儒家的治世理念,更勿论汉王朝对儒家的推崇。

以中央政府的权力满足统治者的一己私欲,这种“举国体制”与儒家重集体的思想相一致。而这样的思想一旦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其本来面目就极有可能被遮蔽、扭曲。《论语·阳货》中有言:“唯上智与下愚不移。”^{[13]678}思想一旦被意识形态化,成为统治之术,就会庸俗化,而变得毫无生机。汉王朝追求宏伟的审美趣味,在武帝时尤为剧烈,其广修宫苑,穷兵黩武,以展现汉王朝的大国风貌,严重破坏了社会基层组织,使整个社会失去了自然发展的能力。武帝之后,汉王朝便由盛转衰。班固评孝昭帝时言:“(按:孝昭帝)承武帝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12]233}由此可见汉武帝之推崇奢靡、宏达之风对社会的破坏程度。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 吴调侯,吴楚才选.古文观止[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4] 胡塞尔.第一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86.
- [5] 魏全瑞.三辅黄图校注[M].何清谷,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 [6]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 [7] 何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8]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9] 刘义庆.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3:7.
- [10] 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16.
- [11]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5.
- [12] 程俊英.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643.
- [13] 刘宾楠.论语正义[M].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678.

(责任编辑:董应龙)

(上接第79页)

- [4] 唐建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2.
- [5] 孙进己.论民族融合的不同类型及中华民族融合的不同状况[J].史学集刊,2003(1):10-15.
- [6] 杨建新,贺卫光.也论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良性发展模式”——与钱国旗同志商榷[J].民族研究,2000(5):43-48.
- [7] 陈通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J].云南社会科学,1993(2):56-63.
- [8]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王明雯)